

老子研读

董平 著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老子研读

董平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子研读/董平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5.7
ISBN 978-7-101-10983-2

I.老… II.董… III.①道家②《老子》-研究 IV.B22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1212 号



书 名 老子研读
著 者 董 平
责任编辑 余 瑾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½ 插页 2 字数 27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983-2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导论.....	1
一章	43
二章	50
三章	57
四章	63
五章	66
六章	70
七章	72
八章	74
九章	77
十章	79
十一章	84
十二章	86
十三章	90
十四章	92
十五章	96
十六章	100
十七章	104
十八章	106
十九章	108

二十章	111
二十一章	116
二十二章	120
二十三章	124
二十四章	127
二十五章	129
二十六章	136
二十七章	139
二十八章	141
二十九章	145
三十章	147
三十一章	149
三十二章	151
三十三章	154
三十四章	157
三十五章	159
三十六章	161
三十七章	164
三十八章	167
三十九章	172
四十章	176
四十一章	181
四十二章	185
四十三章	190
四十四章	192
四十五章	194
四十六章	196

目
录

四十七章	198
四十八章	200
四十九章	202
五十章	205
五十一章	207
五十二章	210
五十三章	214
五十四章	216
五十五章	218
五十六章	220
五十七章	223
五十八章	226
五十九章	228
六十章	231
六十一章	233
六十二章	235
六十三章	237
六十四章	240
六十五章	243
六十六章	247
六十七章	249
六十八章	252
六十九章	254
七十章	257
七十一章	259
七十二章	261
七十三章	263

七十四章	265
七十五章	267
七十六章	269
七十七章	271
七十八章	273
七十九章	276
八十章	280
八十一章	284
后记	287
主要参考书目	290

导 论

一、关于老子这个人

作为先秦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以及《老子》(也称《道德经》)这部书的作者,老子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整体发展,对古代的政治理念、作为宗教之道教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民族文化之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都产生了莫大的历史影响。但关于老子这个人本身的生活事迹,我们其实并不占有太多的可靠资料。这一情况并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其实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时候,关于老子这个人的具体情况就已经语焉不详了。《史记》卷六十三《老子列传》记载了三个人:李耳、老莱子、太史儋,也说明在司马迁看来,这三个人都可能是“老子”。《老子列传》记“李耳”说: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记“老莱子”说：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记“太史儋”说：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①

《史记》记载这三位可能的“老子”，都可谓言辞恍惚，语焉不详，实在无法提供多少真实有效的可靠信息。汉世以后，由于道教的渐趋发达，关于“老子”其人遂更增添出许多附会与神话，渐由“隐君子”而成为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其历史的真实面目就愈加地扑朔迷离，以至于很难分辨了。

但中国学术向有通过考证而求取事实的传统。秦汉以来，人们对《老子》一书的研究不断，对“老子”其人的研究便也不断。清代汪中（1745—1794年，字容甫）撰《老子考异》，认为著书“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的“老子”应为太史儋，更唤起了人们关于“老子”其人其书这一问题的浓厚兴趣。现代以来，一时学者之选如梁启超、钱穆、罗根泽、唐兰、顾颉刚、黄方刚、郭沫若、吕思勉等等，都对这一问题纷纷发表意见，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钱穆先生的考证认为，先秦能称为“老子”的有三个人：一是老莱子，二是太史儋，三是楚国人詹何。老莱子即是《论语》中的“荷蓀丈人”，所谓孔子见老子，也即是孔子在周游列国的途中遇见了原本为“芸草老人”的老莱子而已（按：若照此说，就并无“孔子问礼于老子”之事）；而所谓“老子”姓李名耳，实则李耳即是离耳，“李”、“莱”音近，也即是老莱子。太史儋是周王室的史官，生活于周烈王时，曾西入秦见秦献公。詹何则为

^① 以上引文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140—2142页。

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于今难行也。”老子曰：“夫说者流于辩，听者乱于辞。如此二者，则道不可以忘也！”^①

《庄子》中也有关于孔子见老子的记载：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②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③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噭，予又何规老聃哉！”^④

《史记》除《老子列传》以外，《孔子世家》载：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⑤

^① 《孔子家语通解》，第129页。按：“如此”，王肃注本作“知此”。

^② 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77—478页。

^③ 同上书，第516页。

^④ 同上书，第525页。

^⑤ 司马迁：《史记》，第1909页。

又《仲尼弟子列传》：

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①

上面所引的材料，既有出自儒家的，也有出自道家的，也有出于《史记》的，似乎不同的文献传统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孔子见老子之事实的存在。虽然其内容差异很大，其中既涉及问“礼”，也涉及问“道”，也有类似于《老子列传》的孔子对于老子的赞叹，但孔子曾经向老子请教过礼之类问题，我个人以为应当作为一个事实而加以肯定，只不过孔子究竟在何时拜访老子而向他请教，则古史失载，今天已经无法详考了。孔子原以博学多闻而著称，其“学而不厌”，竟至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那么他向曾做过“周守藏室之史”的老子去请教周礼，似应在情理之中。如若孔子曾见老子，那么老子即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尽管他们在年龄上有较大差距，很可能当孔子还是个青年的时候，老子就已经是位历尽沧桑的老人了（一说老子比孔子大二十岁左右）。

不过我们虽然可以认同有“孔子问礼于老子”之事，但若由此而得出儒家源出于道家的结论，则显然是过于鲁莽的。我一向所坚持的观点是，西周王政制度的崩解乃是春秋诸子所共同面临的基本时代语境，重建制度的秩序而“超出混战”，则是自春秋以至战国诸子思想的共同关切，虽诸子的思想面貌各不相同，但其中是存在着文化内涵上的内在统一性的。“道”的寻求是贯穿于春秋诸子思潮中的一个公共话题。面对着以“礼”为典范的王政制度的行将全面崩解，孔子对这一制度仍抱持着热烈的向往与殷切的期盼，因为他看来，礼的制度体现了生活本身的完美秩序，是蕴含了三代以来的文明理想与高度的人道价值的，而现实的人则不能脱离人道价值的世界而获得其生活的意义，所以他主动选择了教育，试图

① 《史记》，第 2186 页。

楚国人，生活于战国时代。至于《老子》一书，钱穆先生认为如果一定要为《老子》确定一个作者，“则詹何或庶其近之”。正因有此判断，所以他以为《老子》一书成书甚晚，“据其书思想议论及其文体风格，盖断在孔子后。当自庄周之学既盛，乃始有之”，而又在荀子之前^①。这样就又引出了关于《老子》一书之时代的争论，此点我们留待下文再说。

“老子”这个人究竟是谁？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虽然学术界曾就这一问题进行过相当热烈的讨论，但终究没有得出一致的意见。就今天而言，学术界大致的观点，便仍然主要根据《史记》的记述，认为老子名李耳，亦曰老聃，曾担任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孔子曾向他请教过礼。而随着西周制度的解体，天下大乱，他便引身退去，西出函谷关，“莫知其所终”。把守函谷关的关令尹喜在老子出关之前，勉强让他写下“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此即为《老子》一书或《道德经》的来历。

据《史记》以及其他史料的记载，与老子相关的一个重要事件，也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公案”，就是“孔子问礼于老子”。关于这一事件的观点，学术界同样聚讼纷纭。钱穆先生因主《老子》一书晚出，而孔子所见不过一南方“芸草之老人”而已，所以力主此事非真。在《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辨》一文中，钱穆先生经过仔细考证后认为：“孔子见老聃问礼，不徒其年难定，抑且其地无据，其人无征，其事不信。至其书五千言，亦断非春秋时书。”^②南宋叶适在《习学记言》中说：“司马迁记孔子见老聃，叹其犹龙……以庄周言考之，谓关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亦言孔子赞其为龙，则是为黄老学者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辞也。二说皆涂引巷授，非有明据。……然则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必非礼家所谓老聃，妄人讹而合之尔。”^③可见叶适也不信有《史记》所载的“孔子见老子”之事，但他的怀疑主要是以《老子》一书所呈现的思想面貌与孔子之学的重大差异为基础的。所以在他的看来，即便有所谓孔子见老子之事，那么孔

^① 详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老子杂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4—260页。

^②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39页。

^③ 叶适：《习学记言》卷十五《老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8—129页。

子所见的老子也一定不是著《老子》一书的老子；著《老子》一书的老子，也一定不是孔子曾经问礼的老子。钱穆先生考证《老子》一书的作者乃为詹何而非老聃，某种意义上倒与叶适之见相暗合。

不过学术界相信有孔子问礼于老子之事的同样也大有人在。事实上，古代儒家文献也有孔子关于礼的见解“闻诸老聃”的记载。如《礼记·曾子问》：

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返其庙。君去其国，大宰取群庙之主以从，礼也。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主出庙入庙，必跸。’老聃云。”^①

曾子问曰：“葬引至于垣，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垣，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玷患。’吾闻诸老聃云。”^②

《孔子家语·观周》谓孔子与南宫敬叔俱适周，“孔子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③，又记“孔子见老聃而问”曰：

孔子见老聃而问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吾比执道，而

① 朱彬：《礼记训纂》，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98页。

② 同上书，第309—310页。

③ 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125页。

通过个体身心秩序的建构来实现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重建以及人道价值的回归。他是以现实政治的严厉批判者,人道文明传统的历史继承者、传递者与启迪者的角色而进入历史的。但老子不同,或许他对西周王政时期通过制度来体现的公共秩序有更为清晰的记忆,因而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便有更加痛切的感受,但现实社会对于大道的背离,犹颓阳之西下,犹江河之混混,已然无法挽救,所以他选择了隐退,选择了与真理同归,他是以一个真理的体悟者、社会政治的关切者与批判者,同时又是现实世界的隐退者的多重身份而进入历史的。他们进入历史的不同姿态,实质上也即是儒、道两家的思想所展开的不同意义与价值境域。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①孔子博学而不耻下问,却又学无常师,所以其问礼于老子,乃为其学无常师提供了一个显著例证,却全然不足以改变其思想结构之整体取向与老子的重大差异。“吾道一以贯之”,孔子虽博学于文、好古敏求、学无常师,但一切所学都成为其“一以贯之”之道的思想元素而已。

的确,《老子》一书所呈现出来的基本思想面貌,与以孔子为典范的儒学在学术取向以及思想旨趣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思想旨趣上的重大差异并不足以否定孔子见老子本身作为一个事件的存在,尽管关于这一事件的意义解读在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学者那里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司马迁在《老子列传》中说:“世之所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历史上儒、道二家之相绌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绵长故事,并且在今天也同样有其深远影响。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但究实说来,天下只一道而已。儒、道二家所呈现出来的思想面貌及其理论境域的差异尽管是重大的,但这种差异性,原始要终,实在于儒、道二家的典范思想家们关于“道”这一中国文化之本根概念的理解与领悟切入了不同的维度,“道”自身的实在状态及其实在性被表达的领域因此也获得了不同维度的呈现,“道”所展开的意义世界便也因此而各有千秋。然“道”作为宇宙一切万物之所从出的本原性内涵,

^① 《论语·子张》。

在儒、道二家那里其实是同一的。

二、关于《老子》这部书

如果略去历来关于老子的各种史料考证以及不同学者的意见分歧，那么关于老子这个人其实是没有太多的话好说的，但若说到《老子》这部书，却好像有不少的话可以说。这里我们先就这部书谈一些“外围”的问题。

1、关于《老子》成书的年代问题

如前所述，如果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孔子曾见老子并问礼，老子见周世之衰而出函谷关，因尹喜的留难而强为“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那么《老子》一书便成于孔子之前，约当春秋晚期。司马迁这一记载的要点在于两点：一是肯定有李耳或老聃这个人，二是肯定他就是《老子》一书的作者。在肯定这两点的前提之下，那么说《老子》一书成于春秋晚期、早于孔子似乎就是当然没有问题的。但自宋代以后，《老子》一书的时代问题似乎愈来愈成为一个问题，主张《老子》晚出，成于战国中期甚至汉初黄老之学兴起之后的观点开始出现，围绕这一问题而产生的不同意见也一直争讼不息。不过在今天看来，这一问题似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解决。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据考证，甲本的抄写年代，“可能在(汉)高帝时期，即公元前二〇六至一九五年间”，乙本的抄写年代，“可能在文帝时期，即公元前一七九至一六九年间”^①。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有三种《老子》的节抄本，这些抄本的抄写年代要早于墓葬的年代（公元前278年）应当是可以肯定的。帛书本、竹书本的发现，至少可以说明：第一，《老子》一书不可能成于汉代；第二，在战国中晚期《老子》一书就已经流行。结合先秦其他文献对《老子》的引用，那么《老子》一书成于春

^① 《马王堆汉墓帛书(一)·出版前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页。

春秋晚期而早于孔子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其流传过程之中，其中会羼入一些战国时期的观念则是可以理解的。后世观念的羼入，并不足以改变《老子》一书的基本成书年代。

2、关于《老子》一书的基本性质问题

所谓《老子》一书的“性质”，是指这部书的主旨究竟是讲什么？司马迁谓老子著“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那么也即是说，《老子》一书的基本性质就是“言道德之意”。如果把“道德之意”理解为“哲学”，那么《老子》是一部哲学著作，这一点原本是清楚明白的。在魏晋玄学时期，《老子》是“三玄”之一，王弼注《老子》，特重其玄旨的发挥，显然是把它视为一部深含玄理的哲学著作的。但在唐朝元和四年（809年），王真著《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四卷，特发《老子》“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的高论，由此而引出了关于《老子》是否为“兵书”的争论。在给皇帝的“叙表”中，王真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人之所甚恶”。若是“逆德”之人而轻于用兵，兵即是险危之道，所以善用兵的人必须具有“上德、上仁、上义、上礼”，老子正是为了预防后代人君之轻用其兵，“由是特建五千之言，故先举大道至德、修身理国之要、无为之事、不言之教，皆数十章，之后方始正言其兵。原夫深哀微旨，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何者？伏惟道君降于殷之末代，征伐出于诸侯，当其时，王已失众正之道也久矣，且不得指斥而言，故极论冲虚不争之道、柔弱自卑之德以戒之。夫争者，兵战之源，祸乱之本也。圣人先欲堙其源，绝其本，故经中首尾重疊，唯以不争为要也。夫唯不争，则兵革何由而兴？战阵何因而列？故道君叮咛深诫，其有旨哉！其有旨哉”^①！既然“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那么《老子》一书的“性质”无疑就是“兵书”了。此后言《老子》者，将它与兵事联系到一起的现象，就并不鲜见了。如朱熹在谈到《老子》时，认为老子“只是欲得退步占奸，不要与事物接”，“故为其学者多流于术数，如申、韩之徒皆是也。其后兵家亦祖其说，如

^① 王真：《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卷首《叙表》，《老子集成》本。

《阴符经》之类是也”^①。朱熹的这一观点，在近代则有章太炎先生与之呼应：“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故事，约《金版》、《六韬》之旨，著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其治天下同其术，甚异于儒者矣。”^②虽朱熹、太炎先生都指出了《老子》为兵家所推崇，但实际上都是在批判的意义上来讨论这一现象的，更没有明确讲《老子》一书即是“兵书”。王夫之在《宋论》中同样对《老子》的论兵之说及其为兵家所师法的现象进行了批判：

老氏之言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言兵者师之，为乱而已矣。……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正不足而以奇济之，可以暂试，不可以常用；可以脱险，不可以制胜；可乘疲寇而速平，不可御强敌而徐效。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后可奇也。舍正用奇，而恃奇以为万全之策，此古今画地指天之妄人，误人家国者所以积也。^③

用兵者，正而已矣。……老氏者，持机械变诈以徼幸之祖也。师之者，速毙而已矣。^④

事情原本是十分清楚的，《老子》中虽有谈兵的内容，但主要是对战争取批判态度，是老子对社会进行批判的一个方面，与《孙子》之专论用兵之道，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唐朝王真所担任的原是武职，他趋附当时崇尚《老子》的风气而附会其说，以为“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借以引起皇帝对于兵事的重视，大概也情有可原。而后世凡注意到《老子》言兵内容的，则大抵取批判态度，并没有从正面肯定其为“兵书”。稍有例外的或许算是魏源。魏源曾著《老子本义》、《孙子集注》，在《孙子集注序》中，魏源说：“《老子》，其言兵之书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吾于

①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9页。

② 章太炎：《儒道》，《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8页。标点略有不同。

③ 王夫之：《宋论》卷六《神宗》，《船山全书》第十一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68页。

④ 同上书，第170页。